

朱熹与宋代刻书

曹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年十八登进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孝宗时历任枢密院编修官、知南康军、提点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知漳州、潭州;宁宗时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六年(1200)病死。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称徽国公。朱熹一生在学术等方面颇有建树,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他的理学思想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以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书。大量材料表明,朱熹不仅是一位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版本学家。

朱熹非常重视刻书,他一生与尤袤、何叔京、林黄中、陆子美、陈同甫、郑景望、程可久、李季章、许顺之、范伯宗、刘平甫、程允夫、吕子约、吕祖谦等人书信往还甚密,书信内容多与刻书有关,或推荐书稿,或评论版本得失,是研究宋代刻书的重要资料。朱熹把刻书当作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其态度之严谨,世所罕见。这与当时的滥刻之风,正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朱熹认为,一本书要不要刻,应当慎重考虑,不得随意为之。朱熹认为,宋代盛行的“自刊诗文”之风“极可笑又可叹也”。^①他说:“平日每见朋友轻出其未成之书,使人摹印流传,而不之禁者,未尝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远也。”^②有一次学官未经允许刻印了他的著作,他马上去信列举四条理由予以劝阻,力述拳拳之意,并要求自己掏钱把已刻之版全部买下销毁。他在给杨教授的信中说:“熹昨日面恳寝罢镂版事,未蒙深察,窃自愧恨。诚意不孚,言语不足以取信于左右,欲遂息默,则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须至再有尘渎,兹事之不可者四而长者未喻区区之心者一。此书虽多前贤之说,而其去取尽出鄙见,未必中理,或误后人,此不可一也。政使可传而修改未定,其未满鄙意者尚多,今日流传既广,即将来盖棺之后,定本虽出,恐终不免彼此异同,为熹终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为长吏于此,而使同官用学钱粮刻己所著之书,内则有朋友之譏责,外则有世俗之讥嘲,虽非本心,岂容自辩,又况孤危之纵无,故常招吻唇。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悦者得以为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咕囁使人厌闻,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难事,正如顷年魏安行刻程尚书《论语》,乃至坐脏论,此不远之鉴,此其不可之三也。近闻婺源有人刻熹《西铭》等说,方此移书毁之,书行未几,遽自为此,彼之闻者,岂不怪笑!其被毁者,岂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于乡党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恳于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罢之,其所已刻者,熹请得以私钱奉赎毁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议,别刻一书,以成仁者开广道术之意。”^③当然,朱熹也不是一概反对刻印自己的著作,他只是主张慎之又慎,以免谬种流传。朱熹一生除了自己

刻书数种之外，还帮助别人刻了不少书。然而他所提供的书稿底本，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底本确定之后，他总是请书工认真抄写校对后才予付梓。版片刻成之后，还要多次校勘，发现错误，就请刻工赶快修改。绍熙二年(1190)，朱熹在临漳(今福建漳州)主持刻印了四经四子。“四经”即《周易》、《诗经》、《尚书》和《春秋左氏传》；“四子”即《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为什么要刻“四经”呢？他说：“近刻《易》、《诗》、《书》于郡帑，《易》用吕氏本古经传十二篇，而细《诗》、《书》之序置之经后，以晓当世，使得复见古书之旧，而不锢于后世诸儒之说。顾三礼体大未能绪正，独念《春秋》大训圣笔所刊，不敢废塞，而河南邵氏《皇极经世》学又以《易》、《诗》、《书》、《春秋》为皇帝王霸之书，尤不可以不备，乃复出左氏经文别为一书，以踵三经之后。其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故不能悉具，异时有能故吕氏之法而为三经之音训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④为什么要刻“四子”呢？他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声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⑤由于刻印方面的原因，四经四子出现一些错误，朱熹马上令匠人改正，他在给藤德章的信中说：“向在彼刊得四经四子，当时校刊自谓甚仔细，今观其间，乃犹有误字，如《书·禹贡》厥贡羽毛之‘羽’误作‘禹’字，《诗·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误作‘王’字，今不能尽记，或因过目，遇有此类，幸令匠人随手改正也。古《易》音训最后数版有欲改易处今写去，所欲全换者两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原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写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写过，看令不错误，然后分付匠人改之为佳。”⑥除了四经四子之外，《南轩集》、《韩文考异》等书的底稿也是由朱熹提供的。《南轩集》是南宋著名学者张栻的别集。张栻字敬夫，号南轩，和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张栻死后，其弟张杓哀其故稿嘱朱熹论定，朱熹又访得四方学者所传数十篇，益以平日往还书疏编次缮写，未及竣事，已有其它版本先行流传，但就质量而言，朱熹所编本收罗的作品较别本完整，包括了张栻一生的主要著作。《南轩集》刻印之前，朱熹详校一过，并提出修改意见，他在给胡季随的信中说：“《南轩集》误字已为校勘，今却附还，其间空字向来固已直书。尤延之见之，以为无益而贾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补，后人读之，自当默喻也。但序文后段若欲删去，即不成文字，兼此书误本之传，不但书坊而已，黄州印本亦多有旧来文字，不唯无益，而反为累，若不如此说破，将来必起学者之疑。”⑦韩愈文集在宋代已有多种版本，各本互有异同，方崧卿所作《韩文举正》虽参校众本，实则惟以馆阁本为主，多所依附迁就，而且该书体例也不太妥当。朱熹因复加考证，作《韩文考异》十卷。朱熹自序说：“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岁南安军所刊方氏校定本号为精善，别有《举正》十卷，论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无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他本虽善，亦弃不录。至于《举正》则又例多而辞寡，览者或颇不能晓知，故今辄因其书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⑧当《韩文考异》付刻的时候，朱熹尤为慎重，他在给廖子晦的信中说：“袁子质、郑文振欲写本就彼开版，恐其间颇有伪气，引惹生事。然当一面录付之。但开版事须更斟酌耳。若欲开版，须依此本重刊一本韩文方得，又恐枉复劳费工力耳。”⑨在吕祖谦刻印程颐《易传》之前，他反复比较诸本优劣，然后决定弃取，并要求书坊认真抄写核对，他在给吕祖谦的一封信中说：“《易传》六册，今作书托刘衢州达左右，此书今数处有本，但皆不甚精，此本饒正稍精矣，须更得一言喻书肆仔细依此誊写，勘覆数四为佳。”⑩《易传》刻成之后，他发现一些错误，急令刻工改正，他给吕祖谦的另一封信中说：“小本《易传》尚多误字，已令儿子

具禀，大本校讎不为不精，尚亦有阙误，扫尘之喻信然，能喻使改之为幸。闻又刻《春秋胡传》，更喻使精校为佳。”^⑪吕祖谦打算刻印宋代著名学者张载的文集，朱熹劝他慎选底本，他对吕祖谦说：“《横渠集》（张载家住凤翔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刊行甚善，但不知用何处本，若蜀中本即所少文字尚多，俟寄来看，或当补，即作别集也。”^⑫朱熹亲自参与刻书活动，事必躬亲。在刻《礼书》时，书工难觅，为之焦虑数日，他在给刘季章的信中说：“《礼书》此数日来方得下手，已整顿得十余篇，但无人抄写为挠。盖可借人处皆畏伪学之污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远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写，但资用不饶，无以奉此费耳。”^⑬由于他常与书工交往，对书工非常熟悉，他曾写过一首诗，题为《赠书工》：“平生久要毛锥子，岁晚相看两秃翁。却笑孟尝门下士，只能弹铗傲东风。”^⑭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书工的牺牲精神，高度评价了书工的作用。宋代由于雕版印刷发达，纸张供不应求。为了印书，朱熹到处张罗纸张。有一次，他弄到一万张纸，怎样使用这一万张纸呢？他对印工说：“欲印经子及《近思》、《小学》二仪，然比板样，为经子则不足，为四书则有余。意欲先取印经子，分数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余少半者印它书，似亦差便。但纸尚有四千未到，今先发六千幅，便烦一面印造，仍点对，勿令脱版为佳。”^⑮朱熹到了晚年，左目失明，但他仍然热爱刻书、坚持刻书。他在给林德久的信中说：“《中庸章句》已刻成，尚须修一两处，以《或问》未罢，亦未欲出，次第更一两月可了。大抵日困应接，不得专一工夫，今又目盲，尤费力尔。不知天意如何，且留得一只眼，了些文字以遗后来，亦是一事。今左目已不可治，而又颇侵右目矣。”^⑯

除了亲自参与刻书活动之外，朱熹一直注视着代刻书风气，他对当时盛行的自刊诗文、作伪、盗印之风多所批评。他对当时书坊大刊科举应试之文（即时文）深感不安。他说：“此间与时文皆已刊行，于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奸巧之弊熟矣，正当以浑厚朴素矫之，不当崇长此等、推波以助澜也。”^⑰他深信那些“不成器”的版本必定自生自灭。他说：“今人得书不读，只要卖钱，是何见识！苦恼杀人，奈何奈何！余隐之所刊，闻之已久，亦未之见，此等文字不成器，将来亦自消灭，不能管得也。”^⑱麻沙书坊曾盗印吕祖俭（字子约，吕祖谦之弟）的著作，祖俭曾上告官府，官府无能为力，朱熹对此深表同情，他在给吕子约的信中说：“恭兄文字状子已投之，当路如醉如梦，面前事尚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近日百怪竞出，不可禁遏，又甚于前。此既无可奈何，但当修其本以胜之，早为收拾平生文字训说之略成书而可传者著为篇目，而公传道之，则彼托真售伪者将不禁而息矣，若但筑堤埋水，决无可救之理也。”^⑲他在给沈叔晦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件事：“麻沙所刻吕兄文字，真伪相半，书坊嗜利非闲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语，但能为之太息而已。”^⑳宋代公使库刻书相当普遍，“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与边县州军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自恣，若帅宪等司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热药，为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东南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于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有五六千斤，以至数千瓶。”^㉑公使库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为了巴结上司，公使库对于来往“公使”多所贿赂，其资金来源于卖酒、刻书等。有些地方官吏利用公使库刻书之便，贪污盗窃，无所不作。淳熙八年（1181）台州唐仲友案便是一例。唐仲友，字与政，金华人，绍兴进士，复中弘词科，后守台州，为朱熹所弹劾。朱熹曾六次上书揭发唐仲友以刻书为名，行贪污之实。《按唐仲友第三状》云：“仲友自到任以来，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刻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其第一次所刊赋板印卖将漫，今又关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又乘势雕造花板印染斑纈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

用。”还说：“公库之钱既富，乃巧作名色，以馈送为名，多至五百贯，少至数十贯，专委公库手分马澄支行及书表司杨楠伪作书札，送与官员。”②《按唐仲友第四状》云：“据库子叶志等供：草簿内仲友于公库支钱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六贯六百八十二文送惠与人，内一千四百八十二贯二百六十三文送妻兄及与第二儿妇之父何知县何教授何宣教兄弟。”③《按唐仲友第六状》云：“唐仲友开雕荀杨韩王四子印板，共印见成装了六百六部，节次经纳书院，每部一十五册，除数内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后节次送与见任寄居官员，及七部见在书院，三部安顿书表司房，并一十三部系本州史教授、范知录、石司户、朱司法经州纳纸兑换去外，其余三百七十五部，内三十部系表印及三百四十五部系黄坛纸印，到唐仲友逐旋，尽行发归婺州住宅内一百部，于二月十三日令学院事董显等与印匠陈先等打角用箬笼作七担盛贮，差军员任俊等管押本宅，及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授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担用箬笼盛贮，差承局阮崇押归本宅；及一百七十五部于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陈先等打角同别项书籍亦用箬笼盛贮，共作二十担，担夯系差兵级余彦等管押，归宅分明。”④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说明，朱熹虽热心刻书、支持刻书，但如果以刻书为名，进行非法活动，他是坚决反对的。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朱熹还向朝廷提了不少刻书方面的建议。淳熙六年（1179）他曾建议朝廷重刻《政和新仪》以维护封建礼教。他说：“欧阳公言古礼今皆废失州县，幸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之祭，民犹得以识先王之礼，而吏多不习，至其临事，举多不中，而色不庄，使民无所瞻仰，见者怠焉。熹始读之，每疑其言之过。及仕州县，身亲见之，而后知公之不安也。淳熙己亥初守南康，尝一言之朝廷，为取《政和新仪》镂版颁下，而其本书自多抵牾，复以告焉，则莫之省焉。”⑤他的建议非常具体，对于版本、插图等都一一涉及，他说：“欲乞特赐申明检会《政和五礼新仪》内州县臣民合行礼制镂板，行下诸路州军。其坛壝器物制度亦乞彩画图本，详著大小高低广狭浅深尺寸行下，以凭遵守。”又说：“契勘王公以下冠昏丧祭之礼，鄂州见有印本，但恐其间或有谬误，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给降，不须别行镂版，其州县祭礼及坛壝器服制度，即乞检会抄写图画，别为一本，镂版颁下。”⑥为了保证国家税收的顺利进行，朱熹还向皇帝建议恢复刊印由子的制度，由子即收税凭证。按照过去的惯例，收税之前，官府刻印收税项目及其数额分发税户，以便准备。朱熹说：“诸县旧例，每逢二税起催前期印造由子，开具逐户产钱出入及合纳税物逐项数目，给付人户，以凭送纳。近年诸县间有都不印给由子，致人户无凭送纳。或有所纳过多，既成虚费；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约束，依例及时印给。”⑦

朱熹不仅是一位出版家，而且是一位版本学家。他对宋代各种版本的优劣和真伪了如指掌。在他的著作里，多次提到了建阳本、四川本、福州本、鄂州本、婺州本、长沙本、黄州本、信州本、监本、馆阁本、漕司本、仓司本、石本，等等。例如，他在给巩仲至的一封信中谈到《楚辞》福州本时说：“福州旧有《楚辞》白本，不知印板今尚在否，字书样版颇佳，岁久计或漫灭，然雠校亦不至精，不知能为区处，因其旧本再校重刻以贻好事否？”⑧他在给陈明仲的一封信中谈到《二程文集》长沙本时说：“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处，止是长沙初开本，如《易传序》沿流作汭流，祭文侄作犹子之类，皆胡家以意改者，后来多所改正，可从子飞求之，殊胜此本也。”⑨他在给宋深之的信中谈到《南轩集》黄州本时说：“南轩文此间镂板有两本，其一熹为序者差不杂，黄州亦有官本，篇帙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⑩因为朱熹寓居福建建阳，所以他对建阳本尤为熟悉。在他的作品中，谈到建阳本的次数最多。他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今知县事会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余金鬻书于市，上自六经下及训传史记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⑪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说明建阳本在宋代流传全国，影响

之大；第二，说明建阳本的内容十分丰富，经史子集，四部皆备，随时都有成书供应。建阳号称“图书之府”，果然名不虚传。朱熹本人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建阳刻板的。对于建阳本的问题他也是直言不讳的。有一次，建阳书坊盗印了他的著作，刻印质量很差，他去追毁时，书坊已将误本四处销售，朱熹为之悔恨良久。他在给苏晋叟的一封信中曾经谈及此事：“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②建阳书坊为了牟利，常常编造伪书行世，上文所谈吕子约文集真伪参半，便是建阳书坊所为。朱熹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辨别伪书的方法。他在给袁枢的一封信中说：“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③这里，朱熹提出辨伪的两种方法，一是从义理上分析，不合义理者必伪；一是与同书异本相比较，在比较中识别真伪。早在汉代的时候，刘向等人就开始进行辨伪的工作。《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四五十种伪书，反映了汉人辨伪的成就。但是根据现在所掌握的材料可知，朱熹以前虽然人们已经进行过大量的辨伪实践，但是还没有人对辨伪的具体方法进行过认真的总结，朱熹提出的两种方法在中国辨伪史上还是第一次。司马光《潜虚》在宋代已有多本流传，朱熹就是用上述方法查出泉州季思刻本之伪，他在《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一文中说：绍兴十九年（1149）洛阳人范炳文“尝示余以《潜虚》别本，则其所阙之文尚多，问之，云：‘温公晚著此书，未竟而薨，故传止此。’盖尝以手稿嘱景迂晁公补之，而晁谢不敢也。因从炳文借得写本藏之，其后三十余年所见之本皆然，欲访完书，不复可得，每以为恨。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则首尾完具，遂无一字之阙，始复惊异，以为世界自有完书，而疑炳文语或不可信，读至刚行，遂释然曰：‘此贗本也。’问何以知之，予曰：‘本书所有句皆协韵，如《易》篆文象《玄》首赞，测其今有而昔无者，‘行’、‘变’尚协，而‘解’独不韵，此盖不知也字处末则止字为例尔。此人好作伪书，而尚不识其体制，固为可笑。然亦幸其如此，不然，则几何而不遂至于逼真也哉！’”^④朱熹非常注意从内容上鉴别版本，而要从内容上鉴定版本，就必须从校勘入手。朱熹正是一位校勘大师，凭着他那渊博的学识和正确的方法，任何细小的错误都难以逃脱他的眼睛，上文已有多例说明这个问题。在校勘实践中，有些人盲目迷信“真迹”，而不相信印本，朱熹则取分析的态度。他在《书欧阳文忠公集跋尾后》中说：“集古跋尾以真迹校印本有不同者，韩公论之详矣。然《平泉草木记跋》后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诮文饶处富贵招权利而好奇贪，得以取祸，语尤紧切，足为世戒。且其文势至此乃有归宿。又有‘鬼谷之术所不能为者’之下，印本亦无‘也’字，凡此疑皆当以印本为正云。”^⑤谢良佐《论语说》盛行一时，朱熹以吴中刻本、吴任写本和二种胡文定公写本相参校，发现“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文定公问答，皆他书所无，而有提纲挈领指示学者用力处，亦卓然非它书所及。下篇四十七章与板本吴氏本略同，然时有小异。”^⑥《韩文考异》是朱熹一生最重要的校勘成果，为了校好韩愈文集，他网罗了官本、古本、石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莆田方氏等本，相互比较，斟酌去取。他认为方氏《举正》所据三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和馆阁本）“之见信杭蜀以旧阁以官，其信之也则宜。然如欧阳公之言，韩文印本未必误，多为讎校者妄改，亦谓如《罗池碑》改‘步’为‘涉’，《田民庙》改‘天明’为‘王明’之类耳。”^⑦他校书的原则是不看来头，无论官私，以义理为准。“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⑧这反映了朱熹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搞好校勘，除了广博的知识和正确的方法之外，校勘成果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说：“《举正》之篇所立四例颇有自相矛盾者，又不尽著诸本同异，为未尽善。盖此等书前人为之已有成例，若大书本文于上，而用颜监《汉书》法悉注众本之同异于其下，因考其是非以见定从今本之意。则读者有以晓然，

知众本之得失，而益信吾书之取舍不诬矣。万一考订或有未尽，取舍不无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别字，不遂泯没，以待后之君子，尤久远之虑也。”^⑳朱熹《韩文考异》的表现形式十分完美，该书“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注其同异(如云某本某作某)、辨其是非(如云今按云云)、断其取舍(从监本者已定则云某本非是，诸别本各异则云皆非是；未定则各加疑字。别本者已定则云定当从某本；未定则云且当从某本。或监本别本皆可疑，则云当阙，或云未详)，其不足辨者略注而已，不必辨而断也。”^㉑版本学和校勘学是一对孪生兄弟，互为依存，相生相长。校勘学离不开版本学，否则面对芸芸众本，就会扑朔迷离，无所适从；同样，版本学也离不开校勘学，否则面对亥豕帝虎，就会手足无措，以假乱真。朱熹既精于版本学，又精于校勘学，他把版本鉴定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总而言之，朱熹，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他不仅矗立了一代学术的丰碑，而且在刻书和版本鉴定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

- ① (宋)朱熹《晦庵集》(四库全书本)，卷64第14页，《答巩仲至》。
- ②③ 同上书，卷26第4页，《答杨教授》。
- ④ 同上书，卷82第35页，《书临漳所刊四经后》。
- ⑤ 同上书，卷82第40页，《书临漳所刊四子后》。
- ⑥ 同上书，卷49第43页，《答藤德章》。
- ⑦ 同上书，卷53第35页，《答胡季随》。
- ⑧⑳ 同上书，卷76第46页，《书韩文考异前》。
- ⑨ 同上书，卷45第70页，《答廖子晦》。
- ⑩ 同上书，卷33第2页，《答吕伯恭》。
- ⑪ 同上书，卷33第29页，《答吕伯恭》。
- ⑫ 同上书，卷33第24页，《答吕伯恭》。
- ⑬ 同上书，卷51第21页，《答刘季章》。
- ⑭ 同上书，卷10第4页。
- ⑮ (宋)朱熹：《晦庵别集》(四库全书本)卷3。
- ⑯ (宋)朱熹：《晦庵集》(四库全书本)，卷61第6页，《答林德久》。
- ⑰ 同上书，卷33第37页，《答吕伯恭》。
- ⑱ 同上书，卷45第40页，《答廖子晦》。
- ⑲ 同上书，卷47第43页，《答吕子约》。
- ⑳ 同上书，卷52第56页，《答沈叔晦》。
- ㉑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7。
- ㉒ (宋)朱熹：《晦庵集》(四库全书本)，卷18第43页《按台州唐仲友第三状》。
- ㉓ 同上书，卷19第2页，《按台州唐仲友第四状》。
- ㉔ 同上书，卷19第35页。《按台州唐仲友第六状》中书数作606部(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本同)，似不确，疑作603部。
- ㉕⑳ 同上书，卷20第48页，《乞颁降礼书状》。
- ㉖ 同上书，卷29第40页，《乞给由子与纳税户条目》。
- ㉗ 同上书，卷64第19页，《答巩仲至》。
- ㉘ 同上书，卷43第4页，《答陈明仲》。
- ㉙ 同上书，卷58第30页，《答宋深之》。
- ㉚ 同上书，卷78第28页，《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
- ㉛ 同上书，卷55第52页，《答苏晋叟》。
- ㉜ 同上书，卷38第7页，《答袁机仲》。
- ㉝ 同上书，卷81第16页，《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
- ㉞ 同上书，卷82第11页，《书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后》。
- ㉟ 同上书，卷75第4页，《谢上蔡语录后序》。
- ㊱ 同上书，卷76第45页，《韩文考异序》。
- ㊲ 同上书，卷83第6页，《跋方季申所校韩文》。
- ㊳ 同上书，卷44第42页，《与方伯谟》。